



教育经济学高层国际论坛（2012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

暨2012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隆重开幕

2012年11月2日下午，教育经济学高层国际论坛（2012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暨2012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届教育分论坛以“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高等教育教席、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会共同主办，会期三天。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Henry M. Levin 教授，斯坦福大学 Martin Carnoy 教授，波士顿学院 Philip G. Altbach 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前总校长 D. Bruce Johnstone 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 John Morgan 教授，美国斯塔芭芭拉加州大学 Russell Rumberger 教授，印度全国教育规划和管理研究所教育财政室主任 Jandhyala B. G. Tilak 教授，日本筑波大学金子元久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博士，世界银行全球教育主管 Elizabeth King 女士，著名国际期刊 Higher Education 主编 Jussi Välimaa 教授，著名国际期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副主编 Brian P. McCall 教授以及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芬兰等国家的近30名国际知名专家和学者；此外，参加此次学术盛会的还有来自国内（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兄弟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600名专家学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闵维方教授首先为开幕式致辞。闵维方指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有着独特研究对象的学术探究学科，其研究成果为各国教育政策制定、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不可



替代的贡献。他强调，针对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在教育领域的众多先导性教育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仍需要不断深入分析和讨论。最后，闵维方教授真诚地呼吁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共同将大会建设成为一个相互交流借鉴的大平台，为世界教育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善迈教授为会议致辞。他介绍，本次论坛以“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为主题，将围绕“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等众多议题展开广泛的学术研讨。他回顾了全国教育经济学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闵维方教授为开幕式致词
并且肯定了研究会对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最后，王善迈教授预祝学术盛会取得圆满成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博士在致辞中重点谈了世界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他强调，培养更多合格及充满活力的教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各国教育在推进全民教育、实现“达喀尔目标”的路上所面临的重大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必须不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比如高等教育。唐虔博士恳切地说，在实现全民教育的路上，全世界的教育都在面临着多样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他同时也呼吁全世界的学者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完成这一艰难的征程。

三份致辞都提及了当前中国教育乃至全球教育所面临的“公平”和“效率”等核心问题，并期待着教育研究者能够团结一致，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效率，共同推进全球教育发展。

斯坦福大学教授 Martin Carnoy 发表了题为《知识经济中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与机会均等化》的主题演讲。Martin Carnoy 认为，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本应有有助于带来更好的社会流动性及收入分配平等。然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

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没有使其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下降。他对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核心观点：中国与世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无法仅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张来减少其社会不平等性，必须借助政府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波士顿学院教授 Philip G. Altbach 以《学术职业的收入与合约》为题作大会演讲。Philip G. Altbach 展示了一项覆盖28个国家学术薪酬和合约情况的调查研究，指出薪酬不足以及缺乏透明、合理性的学术合约是导致学术界无法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学术薪酬在全球范围内原本就难以具有与律师等其他职业薪酬竞争的能力，而学术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等因素更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学术界人才流失严重等难题。Philip G. Altbach 认为，高校不再大量提供终身教席以及高校教师兼职化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这会带来学术认同感降低等后果，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应该对本国在学术职业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

闵维方教授发表了题为《当前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的主旨演讲，他回顾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着重谈了如何认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如何配置教育资源并建立良好激励机制、如何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以及改善教育公平等当前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和挑战。闵维方教授认为，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教育是支撑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力量，同时还要肩负起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重大责任。种种挑战，都需要教育经济研究者认真思考、努力研究。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教育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质量以及大学生就业倾向与文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Martin Carnoy 教授再一次申明教育的本质目的并非是要消除社会不平等，而是在选拔并培养有才能的人，使之更有效地服务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去促进社会公平。单纯依靠教育难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其代价会非常昂贵，并且会影响教育的效率；就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不会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问题，闵维方教授回应道，高等教育扩张对质量的削弱是正常现象，但顶尖大学的扩张速度远远低于普通大学，其质量不容易受影响；对于大学生就业明显偏好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问题，闵维方教授认为，应该加大政府的支持和优惠政策，来引导大学生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业。

本届教育分论坛共设有九个分会场，将分别围绕“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财政：成本分担和学生资助”、“教育质量”、“教育发展和责任”、“教育管理与政策”、“高等教育财政：国家或地区经验”、“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共同寻求教育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创新解答。

此次论坛引起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京华时报、北京晚报、新京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北京现代教育报、世界教育信息、千龙网、新浪网、央视网、北大新闻网、北大摄影、北大电视台对开幕式进行了现场报道。



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

2012年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第一场报告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第三会议室举行。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主持。来自世界银行及国内知名高校的五位专家、学者就“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进行了报告，并与参会者进行深入探讨。

世界银行全球教育主管 Elizabeth King 女士探讨了学生学习、技能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扩张现象；学习成为这一时期的教育危机，学习产出严重不均。因此学习投资是发展政策中的关键部分，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促进政治稳定。此外，Elizabeth King女士还运用了美国、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例子解释了技能的重要性及其对教育带来的挑战。她认为经济发展要应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生产力增长的挑战，就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全面的学习目标、健全且灵活的教育体系，这也是打造世界一流教育的基础。

大学生就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通过实证研究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大学生就业需求的关系。他指出，从长期趋势看，GDP与大学生就业具有动态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供求关系与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两个重要变量，同时，制度变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因此只有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才能带来稳定的大学生就业，而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宏观政策引导仍然非常必要。

明瑟收益率是教育经济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丁小浩教授汇报了运用明瑟收益方程对中国教育收益率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的研究。她指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呈现稳定快速增长态势；但是之后趋于稳定，并出现轻微下降趋势。丁教授认为，造成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除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外，教育规模扩大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经济变革中相关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都可能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变化有重要影响。

上半场的讨论环节，针对弹性计算公式和模型设定内生性方面的问题，谢维和教授回应道，其研究运用了误差修正模型，并用虚拟变量对制度变量做了简化。而在收益率研究方面，丁小浩教授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但是基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研究只考察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很难引入劳动力流动变量。此外，Elizabeth King女士对职业培训提出了三点建议，分别是要进行有效的基本技能培训、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教育决策者可以通过政策和市场需求来引导学生就业。

在下半场，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教授探讨了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展模式转型中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停滞徘徊的现象。他指出，中国经济虽然在过去33年快速增长，但目前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通过教育与人力资源战略调整来提高人口质量如把农村的职业教育放到突出地位，不断完善成人职业培训体系；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把促进社会的融合与流动作为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都将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业满意度是衡量高校毕业生对所得工作的主观感受，综合评价大学生自身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北京大学岳昌君教授通过对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月收入、就业地点、单位性质等七个工作因素，除人口学特征外其他类别的非工作因素中，均有多项变量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据此，岳昌君教授指出，建立公平、公正、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开放高校毕业生的户口限制、增加毕业生就业的流动性，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关注就业弱势群体，将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和农村职业教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高等教育财政：成本分担和学生资助

2012年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第二场报告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第四会议室举行。来自英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就“高等教育财政：成本分担和学生资助”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与讨论。西安交通大学高教所陆书根教授担任这场会议的主席。

当今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均受到了市场力量的深刻影响，在此影响下，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的Isak Froumin教授以俄罗斯为例，探讨了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他指出，在前苏联时期，高等教育与国家劳动力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种体系下，苏联建立了三种类型的大学。苏联解体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因素，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出现了一些变革。他提出，高等教育体系必须关注其内部结构与外部长期市场需求的关系，以国家和市场为导向，这样才能认识到高等教育体系的特征。

在世纪之交，高等教育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金子元久教授对此做出了回答。他指出，过去的20年中，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高质量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高等教育经历了第二次扩张。在这一背景下，金子元久教授提出，高等教育政策要用市场化、合同-评估体系和机构分化的工具来完成资源整合、效率提高和使教育切合社会需求的任务，并对比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与就学机会的可负担性已成为各国目前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盖浙生教授指出，经济弱勢家庭学生在就学机会上仍居于不利地位，大部分学生不了解政府对其提供的助学措施，高等教育个人成本分担在公私立大学及技职院校有很大差距，造成成本分担的偏颇。他还提出了高等教育就学机会“可负担性”的改进措施。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Jill Johnes教授通过研究1996/97至2008/09年英国高等教育扩张时期英国高校的数据，利用参数和非参数模型，指出两种方法测量的效率有相关性，但相关性较低。其次，基础投入之间的替代以及学术人员与非学术人员之间的替代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她探讨了合并对于高校效率和投入可替代性的影响。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俄、日、美、英国国家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大学效率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下半场讨论聚焦于学生资助政策。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小林雅之教授和刘文君女士围绕日本高等教育入学成本和成本分担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小林雅之教授介绍了日本大学学费和学生资助计划、高等教育中机会平等的现状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随后，刘文君女士介绍了东京大学学费减免的新计划以及日本政府学生贷款的新政策。

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如何认识和落实大学生资助政策，保持高校发展的较大规模和教育质量，是中美政府共同关心的问题。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曲绍卫教授介绍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大学生资助政策变化的基本态势和特征，以及中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主要发展趋势，并在中美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现行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的问题，为完善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框架，包括确保政府持续增加资助额度、不断扩大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范围等。

最后，来自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的沈华教授结合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学生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高校资助政策对他们选择就读学校类型和学科专业的影响。

下半场的讨论环节，学者们针对东京大学学费减免的新计划标准和中国学生资助政策的信息披露展开了对话。小林雅之教授指出，东京大学学费减免的新计划的标准是家庭收入和学生成绩，成绩差的同学不能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不同大学的GPA体系相同，但是GPA评价标准不同。沈华教授则强调，学生需要更多关于资助政策的信息来帮助他们进行院校的选择。

教育质量

2012年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第三场报告会在北



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第五会议室举行。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由美国马里兰大学林静教授担任主席。来自美国、中国大陆等专家、学者围绕“教育质量”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曾满超教授，他以济南地区的高考成绩为研究对象，针对高考成绩中反映的性别差异做了深入分析。报告指出高考成绩中显现的性别差异受到课程、学生成绩以及办学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高考中，除语文、英语两科女生表现优于男生，其它科目以及高考总成绩上都体现不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与国际趋势是一致的。对于一些子群体，例如有兄弟姐妹的女生，其语、数、英成绩及总成绩都弱于男生；理科的女生，其数学成绩也明显弱于男生。针对这种差异的多样性，他指出教育政策应有所倾向。另外，还要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最后，曾教授还从个人与公共的角度分析了性别差异的来源，并建议应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来自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的Russell Rumberger教授指出，保障每个学生的中学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大挑战，而要应对此挑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降低中学辍学率。在系统深入地分析了辍学原因之后，他认为需要从“能力”和“信念”两方面着手。“能力”提升包括专业技术的创新、相关项目的建立以及学校系统的革新。“信念”强化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来自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的支持。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还要未雨绸缪，做好基础教育阶段的干预工作，形成一个完善的教育链条。

世界银行南亚区经济专家Benoît Millot在对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现状的对比分析中，梳理了高等教育支出与产出的错综复杂关系。他发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远远大于其它国家。而在低收入水平国家不仅公共投入少，为满足膨胀的入学人口，还得牺牲教育质量。针对这一系列问题，Benoît Millot指出，增加投入额度很有必要，但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更是不可或缺的，要从对量的关注转到对质的关注。同时，也要重视公共资源和个人投入的结合。虽然挑战巨大，但Benoît Millot认为各国只要“因国制宜”，就能实现教育模式的良好转变。

大学在如何选择教育投资与消费上涉及多个因素，如何选择与分配资源直接影响着大学的所得效益。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Brian P. McCall教授基于近期所做的调查研究指出，一味加大财政向教学质量的投入或者增大教学消费的比重并不能有效提高大学的招生率及效益。那么如何在二者间进行选择呢？Brian P. McCall教授认为，鉴于学生个体喜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大学选择机制取决于该校在校学生总体情况以及该校期望招收的学生群体的相互作用。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数据的来源、真实性、代表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下半场分会聚焦于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团队从2006年开始启动了《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对北京市高等院校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项目进行了汇报。李文利教授首先对项目的整体运行机制进行了介绍，包括项目背景、抽样方法、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框架。本项目采用分层抽样法，通过横向比较和追踪调查的方法，目前已累计发放调查问卷近20万份。该项目旨在分析高校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的教学指导工作与学生全面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深入调查了学生特点、院校环境、学生与教职工互动交流、学术及社交参与对大学生发展的综合影响，积极探索了高等教育成效评估的新范式，及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有效的科学参考依据，以推动高等教育的可持续与卓越的发展。

杨钊就本科生学习发展以及大一新生的适应性问题做了详细的报告。她指出在本科教育方面，总体上讲，重点大学会更注重教学质量和学术质量，也会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度。杨钊还特别呼吁对大一新生的关注，因为学生在这个过渡期的表现对其后的学习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后，朱红教授从学习环境、学生参与、学生发展以及学生满意度这四方面对研究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报告。报告指出，研究生的学习成绩、研究成果与社交表现等方面因学校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硕士生与博士生在学习、科研成果以及对学术、研究和学院的满意度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而对这些差异的关注和分析对未来的研究以及学校教育质量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教育发展和责任

2012年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第四场报告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二层第十四会议室举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Lincoln Kallsen教授担任了上下两场会议的主席，来自世界银行、澳大利亚、印度、中国的学者就“教育发展和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对于教育的国际合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强调要不断推动国际间的交流。澳大利亚工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David de Carvalho介绍了在亚太地区各国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并且对高等教育需求增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资金、政策和网络技术等一系列措施，旨在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他相信，这些投入和努力能够帮助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领域和亚洲国家建立起平等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区域发展和进步，迎接“亚洲世纪”的到来。

高校应该在变革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著名国际期刊Higher Education主编Jussi Välimaa教授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对社会变革的三种不同解释，包括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Välimaa教授认为三种解释虽然相互竞争，但各有侧重。知识、信息技术和网络都是影响社会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构建了大学发展的学术网络。在考察高等教育机构在当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时，应当将他们合理地整合起来。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日益呈现出新的趋势。来自印度全国教育规划与管理研究所的Jandhyala B. G. Tilak教授将焦点聚集到了教育国际化的新趋势——国际教育服务贸易。Tilak教授认为，教育输出国、输入国在这种趋势当中并没有达到双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等问题，而发达国家则受益于国际学生的流入。他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建立自己强大且富有活力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让自己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掌握主动地位并从中获益。

同样针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世界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悉尼大学副校长John Hearn谈到了高校改革中国际化的益处和存在的风险。国际化为高校带来了资源和技术，同时也带来风险和挑战。他指出，在面对国际化时，大学应该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并保留自身特色。另外，组织优秀的团队、建设先进网络、借助可持续国际合作关系的力量等都是高校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上半场的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就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高等教育国际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来自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教育部门主管Eduardo Velez Bustillo呼吁大家认识到教育服务责任的重要性。他指出，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公众有能力影响到政策的制定者或教育服务的提供者。“责任”体现在首先能够让人们获取信息并运用信息，同时也能让人们有反映自己观点的渠道，即有一个申诉问责机制，以便对教育的提供者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对教育的投入并提高教育的质量。Bustillo教授具体以世界银行在乌干达、中国、巴基斯坦等地开展的项目为例，充分而生动地论证了建立透明监督机制对于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影子教育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接受的私人辅导。来自香港大学的Mark Bray教授指出私人辅导在东亚地区非常普遍，但当前的相关研究却比较缺乏。Bray教授向大家报告了他对香港初三和高三学生展开的相关研究，探寻了影子教育的类型、学科内容等，并分析了学校、家庭和个人层面对课外辅导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考试和升学压力、学校水平与学生对私人辅导的需求呈正相关关系，而家庭收入影响不尽相同。Bray教授认为，如果能引起香港以外地区的共鸣，将极大充实私人辅导问题的比较研究和文本研究。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部首席教育专家Kin Bing Wu女士将研究的焦点转到了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问题。她发现孩子出生时的体重、饮食和营养、进入育儿所/幼儿园的就学情况、健康检查情况、看护者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爱护对于三岁孩子的体重、身高和社会、认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对这些方面的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弥补家庭收入、家长学历水平、民族、农村地区或留守家庭等因素造成的孩子发展的差距，有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的关注重点包括：私人辅导问题的研究意义、私人辅导如何定性、私人辅导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关系、对提高学习的作用效果及其接受私人辅导成本效益等问题。

教育的发展和责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今天的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们或着眼当下、或放眼世界，或反思现实、或展望未来，引发了全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怀着对教育的关切之心，共同谋求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美好前景。

教育管理与政策

2012年11月3日上午，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第五场报告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二层第十五会议室举行。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就“教育管理与政策”这一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近年来，教育经济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成果，其中管理与政策问题更是成为研究探讨的焦点所在。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教育经济领域的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而新颖的建构及解构的方式。

来自厦门大学的邬大光教授、香港大学的程介明教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韩民副主任将学术关注焦点集中于教育经费、教育政策经济性问题，并从不同领域、地区和角度出发，进行全方位、多元化的整体探讨。

邬大光教授首先从国际比较视野就高等教育经费的多元化与大学变革的关系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规模扩张、市场经济等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变化的原因，就规模扩张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学发展与生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通过呈现OECD成员国家的统计数据与中国情况进行比较，指出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仅为0.7%，低于64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值0.74%，更远低于发达国家0.9%的水平。同时，深入分析了我国公立大学经费来源少且不稳定等特点也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程介明教授则转向了另外一个主题，从宏观的视角探讨了教育政策的经济性及这种经济性对教育政策制定的启示。他从多角度分析了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的自由化、受教育程度提高、工作模式多元化的变化。对于目前高等教育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和变化表示了担忧。当然，程介明教授也认为单从经济角度论述教育政策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今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我们还需要借助更多的手段和力量来优化现行的教育体制。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韩民副主任就终身学习背景下教育经费投入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特别强调了终身教育的重要性，计划指出在2020年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韩教授将成人继续教育划分为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以及社区教育三大领域，并分别分析了其经费体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上海、广州等城市继续教育新举措的生动事例，对终身教育的公共性与投入性进行了讨论。

来自北京大学的阎凤桥教授则重点关注了城市化进程中民办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满足社会流动人口的学龄子女接受教育，以及不随父母迁徙的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特殊问题。限于公共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公共制度的约束，民办教育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阎教授基于对华东某市的调研，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民办教育的兴起与发展问题。他指出，当地大多设置在城区和县城的民办学校，具有收费低、规模大的平民化办学特点，对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供给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阎凤桥教授提出了民办与公立学校办学目标、办学性质及办学优势是否需要差异界定的现实问题，进而从教育需求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视角对民办学校存在的原因和特性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

随后，围绕民办教育是否要分为盈利和非盈利的问题，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邬大光教授认为对其进行盈利性与否的二元划分是一个误区，应该有第三种定义方式。而韩民教授则认为制度上的模糊性会带来更多的政策问题。阎凤桥教授则站在中间立场，认为中央不应该搞“一刀切”，各个地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好民办教育。

下半场的讨论中，华中科技大学的沈红教授首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大学教师工资与中国表现。沈教授采用了《欧盟学术职业薪金水平全球调查-五十国案例》研究的数据，从高等教育机构的层次与类型、教师的职业发展基础与教师的个人背景等多个维度来研究教师收入问题。集中研究大学教师收入的国别差异，并基于国内11省68所高校调查的详细的数

据和中国国情，分析中国高校教师收入在国际范畴所表现出来的特例。

在讨论了高等教育机构学者薪金问题之后，华中师范大学的范先佐教授引领我们走向对农村中小学教师问题的关注。范教授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为题，首先强调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对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在我国教育发展新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时代意义。范教授通过展示分析全国部分农村的数据调查结果，总结出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堪忧现状。重点分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堪忧的几项根本原因，基于以上分析研究，从教职工编制管理、教师招聘思路、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教师经济待遇等方面为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宝贵的对策建议。

最后，北京大学王蓉教授以“占领制高点的政府和高等教育发展”为题，梳理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脉络。王教授首先列举了三种解释性“故事”：高等教育服务于巩固政府合法性的政治目的、退后性政府对经济市场化的适应以及政府顺应民意的需求。而后她创造性地使用列宁在1922年提出的“占领制高点”理论分析这种变革。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针对三位嘉宾的发言，围绕青年教师低收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高等教育财政：国家或地区经验

2012年11月3日下午，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下午第一场讨论“高等教育财政：国家或地区经验”在北京会议中心九号楼三层多功能厅举行。讨论分为上下两个半场，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陈晓宇教授主持。与会代表结合各自国家经验，分享了对于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心得。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经费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拨款。但是，当经济危机横扫全球，高等教育是否能够适应财政紧缩的新局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前校长Bruce Johnstone教授指出，当前美国高校办学成本不断提高但收入却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大学只能在不断削减成本的同时争取非公共经费的支持，比如增加学费、出租设置、寻求捐助等。在这种颠覆性的变革下，高等教育内部的教学运行模式也受到冲击，这将导致教师工作量的增加、教员工资的缩减和远程学习的扩张。虽然开源节流能够缓解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但是大学内部的深度变革才是真正重要的方面。

经济社会的变化会对高等教育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John Morgan的报告为我们回答了“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保持大学的理念”这一问题。作为该校伦理学会主席，Morgan教授从伦理学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提出挑战。他关注经济和伦理之间的张力，提出我们应该思考大学的显性经济功能与传统的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诸多功能的调和。虽然Morgan教授带来的不是国家或地区的具体经验，但是关于经济与伦理的整合理念对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来自意大利都灵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 Aldo Geuna 教授从比较的视角对欧洲国家的科研拨款和业绩评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英国和意大利的国家科研评估框架是一种基于业绩的科研拨款制度，是高等教育问责制的体现。这种拨款模式一方面使经费拨款体制化，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研究经费过度集中于优势院校，而科研本身也会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志。

除了欧美国家的案例外，研究者对亚洲地区实践的探讨增加了本次论坛的丰富性。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钟宇平教授认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将经费投给普通大学，却把职业教育直接丢给了市场。面对市场失灵导致的种种问题，高职教育亟需政府的介入。钟教授以中国香港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政策、财政等多方面支持高职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政府介入高职教育，才能提高其收益率。

韩国教育发展研究院的 Hyunsook Yu 介绍了近十年来韩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五个主要项目，总结了其成就和不足。她认为未来韩国政府应该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整合项目目标、平衡资助的对象和研究领域、建立公平的高等教育监

测评估体系。除了韩国以外，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Fumihiko Maruyama教授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分析了日本高等教育财政的支持现状。如今，经济萧条和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日本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拨款体现出“选择与集中”的趋势，在这种政策影响下，小规模院校和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将日渐式微。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对科研评估指标、财政危机下的教育质量、高校筹资的新方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场讨论不仅为我们带来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的理念与经验；而且还融合了经济学、教育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的复合功能，为教育政策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

2012年11月3日，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下午第二场报告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第三会议室举行。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由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冯文全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湖北大学、西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上半场主要围绕人力资本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中国近20年来各省的人力资本状况增长如何？空间分布如何以及发展是否均衡？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黄维海博士指出，中国20年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经济欠发达、原有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省份，并且各省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他同时指出，造成人力资本水平不均的主要原因是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区域内部的差异。不均衡的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呈现出一条从东北到华中再到华南的高水平分布带，处于分布带东侧省份的人力资本水平次之，西部的省份最低。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农村教育相关的问题往往值得重点关注与研究。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胡咏梅教授介绍了在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后，农村职业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变化情况。她认为，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而且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户家庭及个人收入均有正向效应。因此，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是加快农村经济转型和调整我国农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举措。同样聚焦于农村职业教育，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的黄斌副教授也认为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民选择非农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超过普通教育。教育通过增加非农从业机会给农民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不同层级和类型的教育具有不同的作用。他还指出，人力资本收益与农民从业类型存在关联，人力资本投资对农业从业者收入无显著影响，但能给非农与混合从业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针对目前国家大力提倡的职业教育，来自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智敏教授着重介绍了目前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技术性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的现象。她认为，高职老师和学生对特殊技术性人力资本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高职学生对自身所获得的技术性人力资本评价较低，希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她还指出，课程设计和有效的技能测试是影响高职学生技术性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而培养模式对高职学生的技能结构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改进培养模式以提高其技术性人力资本和优化其技能结构。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对实证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进行了论述。有学者认为对高职学生的能力衡量不应该用主观判断作为结果指标，采用客观数据和指标会更科学也更具说服力。而针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分布情况，黄斌副教授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的分布除了省际差异外，也存在省内差异，如果把省内差异也考虑进去有可能会致结果收敛。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农村的产业转型升级，许多学者都认为把农村混合劳动力纳入研究十分必要。

下半场的讨论更多地关注于中国的区域教育经济发展问题。来自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高耀博士认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竞争力协调度大体可分为“高水平协调”、“中等水平协调”、“低水平协调”、“高位弱协调”、“低位弱协调”和“极不协调”等六种类型。他指出，研究生教育竞争力与经济发展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在我国东北、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四大区域内部，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采取切实措施以促进区域研究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来自江苏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刘林副研究员则以江苏和浙江为例，引入“共轭”的概念来说明各区域应当使其高等教育投入与人才集聚投入趋

向共轭状态，发挥共轭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实现共轭驱动。

最后，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杨希就我国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资本投资现状，即我国理工科博士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讨论。她认为目前读博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因此，对于博士规模较小的行业，研究生的博士升学意愿就越低，存在科技人才投资的“低技能”陷阱。因此，她提出了是否可以通过教育财政资助的形式来调节和改善“低技能”陷阱的可能。

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2012年11月3日，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下午第三场报告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第四会议室举行。本场会议由新疆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蔡文伯教授主持，来自各地的学者围绕“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家庭贡献是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指标可以部分地反映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沈百福教授指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率远高于美、英、日等14个国家；但从国内的历史数据来看，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率都在减少，其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率的省际差异最大。在另一个重要指标——“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上，2000-2010年东中西三个区域间的差距明显扩大，区域内部省际差异的变化也不一致，东部地区的省际差距变动很小，中部地区的省际差距在缩小，西部地区的省际差距在明显扩大。

在教育质量和成本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祥云教授以一个县的案例研究生动说明了如何同时将教育质量、公共教育成本和私人教育成本纳入成本函数，估算初等学校最优规模的方法。研究表明，在偏远的山区应该保留更多的初等学校，以降低私人教育成本和方便学生入学。

在学界普遍以学业成绩作为教育产出衡量指标的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的候玉娜尝试将非学业发展指标——学生的学校适应性水平（如学习、情绪、行为、自我概念等）作为衡量教育产出的指标。她的研究表明，学校、学生个体及家庭层面的诸多因素，如：教师的学历、学校生均图书、占地面积、教室面积、学生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住校、所在家庭规模、家庭语言、父亲职业等对学生的非学业发展都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实践中应对这些因素加以更多的关注。

基于多元文化的同伴效应是教育生产函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曹妍利用PISA2006年和2009年混合截面数据，通过中国香港地区不同学校外来移民学生在年级中所占的比例及分布状况来分析外来移民构成对香港本地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证实外来移民学生对香港本地学生具有同伴效应。在此基础上，她通过对学生分流政策信息的梳理，结合同伴效应进一步考察不同的学生分流政策对不同移民类型学生可能带来的影响，结果证明学生分流政策对外来移民学生学业成就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主要围绕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包括共线性问题、样本自选择和异质性问题、数据质量问题、模型选择问题等。学者们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比如，以面板数据代替横截面数据，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选择更合适的变量以避免或改善共线性问题等。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者们也在持续关注高等教育扩招的综合影响。来自北京大学的叶晓阳从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角度考察了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他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后高校的组织转型削弱了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弱化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清华大学的李锋亮则着眼于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形式——远程高等教育。他发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远程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都得到了提升，但是远程高等教育的公平程度逊于普通高等教育，这个差距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尤其明显。因此，他建议将远程高等教育作为增进西部地区教育公平的着力点。

最后，武汉工程大学刘丽芳对中美高教资源区域分布差异进行比较。她发现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中国高教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都大于美国。据此她提出优化我国高教资源布局的三点建议，一是构建区域高教合作协调组织，加强跨省区高等教育合作；二是将资源扩张中的“资本自发主导”与“机会指令分配”相结合，促进高教资源在区域间的均衡分布；三是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提高西部地区对高教资源的吸引力。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在于研究中的一些可比性问题。比如,中美之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存在质的差别?另一方面是,不同研究对于东中西部区域的划分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这些研究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此外,还有学者对教育资源分布均衡的内涵提出异议,认为均衡是质的差别,而非单纯的量的差别,仅以数据来表征教育资源分布均衡程度是不够的。

教育管理与政策

2012年11月3日下午,北京论坛“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教育分论坛最后一场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一层第五会议室举行。西南大学张学敏教授担任本会场的主席。来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的教育管理者和学者继续围绕“教育管理与政策”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与讨论。

谈效率就不得不谈资源配置,而预算管理体现了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刘亚荣教授介绍了高校预算管理的两种模式,并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解释了什么是“高校内涵式发展”。她进而指出,高校应该建立一种校院分权的组织结构,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应有的权威影响力,通过预算管理的改革可以很好的实现这一组织特征。学校在财务经费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一方面应留有一定的调控经费,抓住机遇,用于战略引导和重点投入;另一方面应将资源配置权下放给学院,同时约束学院的支出行为,控制浪费经费的风险。

南京农业大学刘志民教授选取发达市场经济体、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南美发展中国家三类样本,对“三化”进程中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作了国际化的比较。他指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不仅要解决培养“新一代农民”的问题,还要解决培养“农民新一代”的问题。不仅要培养农民职业技能,还要培养农民现代文化意识及文化科学等综合素质,并强调要通过强化政策主体间的协调以确保政策的实施效果。

首都师范大学的薛海平教授呼吁,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是我国当前义务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当前应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预警机制的建设、宣传和法制化,围绕预警管理系统建立相应的专业人员队伍和问责制度。他构建了包含指标监测、数据库管理等七个子系统的预警框架。广西大学沈有禄教授则结合广西武鸣县调研的报告,从理想与现实两个角度对县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发表观点,指出了“不均衡”的主要表现,并提出期望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措施。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探讨了影响分权管理的有关因素,并提炼出最主要的两点,一是高校的发展阶段,二是学校内部的惯性。学者们还就“何谓义务教育均衡”与历史发展脉络问题与薛海平教授和沈有禄教授展开了讨论。薛教授认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路径是从充分到均衡再到效率。沈教授指出,均衡肯定要承认差异,但差异要有限度,不能太大,可以通过相关指数来判断目前的均衡状态。

一直以来,家庭规模是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聚焦点。北京师范大学的郑磊教授利用中国西部农村抽样调查数据说明:相对于独生子女而言,拥有一个同胞的孩子其学业成绩并不会显著低于前者,但其心理适应性却显著高于前者。从长期来看,现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利于儿童的全面发展,放松现行生育政策将是一种可行的改进方案。

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家庭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武汉理工大学贾勇宏副教授的课题组调查发现,布局调整之后,受家庭与学校的距离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处于相对弱势的偏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低龄学生、留守儿童、寄宿学生与被关闭校点学生,他们的公平受教育权受到了较大伤害,政府应对这些学生群体进行必要的弱势补偿。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赵丹同样关注中小学布局调整,但他的考察对象是农村的小型学校。他通过调查发现,这类学校的辍学率低、给学生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小、能避免产生新的教育不公平。进而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农村小型学校在中国农村教育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因地制宜加以保留(尤其是不发达山区的农村小型学校),并在资金、设备、师资等方面对其加以支持,以保障农村地区学生的教育公平。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就双子女家庭的性别构成进行了探讨。学者们的观点是:多子女家庭的优势体现了所谓的“规模



经济”，多子女之间也有社会化的互动，而在家庭整体性别构成比例中居于少数的人则处于不利地位。学者们还就研究的方法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赵丹研究中的统计年鉴数据问题以及贾勇宏老师研究中的成绩可比性问题，有学者建议对数据进行完善更新，以使研究更精细。

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2012）圆满落幕

2012年11月4日上午，以“世界经济变化中的教育发展：质量、公平与效率”为主题的教育经济学高层国际论坛（2012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暨2012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落下帷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David Naylor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Henry Levin教授，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善迈教授等众多国内外著名教育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丁小浩教授作大会总结。

Henry Levin教授发表了题为《教育的适应性》的主旨报告。Henry Levin指出，我们需要重视教育的适应性，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使教育满足就业市场的要求。报告中，Henry Levin对就业市场需求变化的预测、教育和生产力的关系、教育质量的衡量、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和劳动力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阐述了教育在劳动力储备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指出了教育适应性的重要意义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他在政府教育政策方面给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建议。

王善迈教授的主旨报告以《中国各省份教育发展水平比较分析》为题，讨论了我国各省份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从地区教育发展总体水平、机会水平、投入水平的和公平水平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各省份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指出了一些省份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我国地区教育发展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参考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教授主持教育分论坛（2012）闭幕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丁小浩教授作大会总结发言。丁教授与大家共同分享了自己的几点体会：首先，教育经济学研究如果能够抓住时代特征就能够让老问题有新的意义，指出学者们要从多个角度来刻画时代特征。其次，教育经济研究中除了要认识自己，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知识和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被国际广泛欣赏和借鉴，并且需要理解不同国家在研究中所存在的差异。第三，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研究的主动权，构建理论、验证假设、寻找模式、做出预测的这一过程仍是我们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模式。她总结道，此次论坛给国内外众多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是教育经济学的一次国际盛会，我们五代学人薪火相传，相信今后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一定会迈上更高的台阶！

会议最后，杜育红教授宣布教育经济学高层国际论坛（2012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暨2012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圆满闭幕。

教育经济学高层国际论坛暨2012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合影留念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2012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012.11.02



主 编：陈晓宇

执行主编：侯华伟

本期内容：葛长丽、侯华伟、尚俊杰

本期美编：崔情情

地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电话：010-62751402

传真：010-62751409

网址：www.gse.pku.edu.cn